



往事怎会如烟

阎焱

早在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之前,日本对华持续侵略就已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从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到1937年7月7日以炮轰宛平县城和进攻卢沟桥为标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反动统治者发动的一次次野蛮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巨大的灾难,也激起中国人民的顽强反抗。天津这座城市早期遭受日本侵略的悲怆和对日抗争的悲壮,虽已年代久远,却不应为我们所遗忘。

1900年,日本作为八国联军投入兵力最多的强盗,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侵入北京前,登陆大沽口,铁蹄踏津门。当时,一个名叫马克里希的英国军人在日记中记录了日军攻打天津城的野蛮行径。7月9日被他命名为“日本日”——“千余名日本步兵和骑兵携带着大炮出发,目的是扫清西面开阔地带的中国军队”“日本骑兵冲进冲出,把暴徒砍成碎块。他们兴高采烈地笑着,福岛将军指挥他的军队上演一出从未见过的最奇妙的战争剧。”7月14日,进入天津城的日本人肆意烧杀抢掠,“他们马上开始了放火和杀戮,抢掠也开始到处出现,大量的贵重丝绸、衣物和古董被抢走。一个士兵在吃力地搬动一座老式座钟,而他的同伴在搬成箱的银子。我们已经看够了战争令人恐怖的结局,燃烧的城市,河中可怕的浮尸,等等。”(见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天津租界史》,[英]穆雷森著、许逸凡、赵地译)这些沉甸甸的血色历史细节不容遗忘。

八国联军的入侵,酿成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根据这一条约,外国军队被允许驻扎在北京至山海关的12个铁路沿线地点,然而早在条约签订前四个月,日本政府即以“护路”为名向这一带派驻了“驻屯军”,并在天津海光寺设立司令部。驻屯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引起当时正求学于天津的李大钊的无比愤慨。1913年夏,李大钊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准备赴日留学,9月11日晚,日本驻屯军在昌黎火车站残杀五名中国铁路

警察。李大钊听闻这一惨案后,对日本人的暴行怒不可遏,他亲自到城北地藏寺,向停棺在那里的五位遇难同胞表示哀悼,后又写下《游碣石山杂记》一文,号召国人勿忘这奇耻大辱的国仇:“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中华领土,以戕我国土,伤心之土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

李大钊对日本侵略者的切齿之恨绝不仅仅只是因为这五位同胞的惨死,早在1912年11月,他在天津法政学校编译《〈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下文简称《驳议》)时,就已识破了日本侵略者的狼子野心。《驳议》是李大钊等学子对日本人中岛端所著《支那分割之运命》的驳斥。中国辛亥革命仅一年后,中岛端便在这本书中信口雌黄,污蔑中国人无共和之资格、无共和之历史、无共和之思想、无共和国民之素养、无共和之信念、无国家观念,疯狂叫嚣日本应快速担起“新兴雄帮”之责任,“尽我大和民族之天职”“西自内蒙古起……而直隶而山西,至少限于黄河之北,不可不置于我之势力范围……江苏、浙江为二十一中省中最便利最膏腴之地,决不可使他国而有之……”面对此等妄图独霸鲸吞中国之狂言,李大钊等学子在《驳议》中直斥:“岛人亦知吾燕赵男儿之勇武乎?燕赵男儿果有一人生者,不令岛人人中华一步也!”

正因李大钊对日本侵略者野心的先知先觉,所以他自天津到日本留学后,得知袁世凯为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他复辟称帝的支持,竟接受日本1915年1月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时,立即代表中国留学生总会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的通电,大声疾呼:“抑日本蕞尔穷岛,力非能亡我中国者……忆昔甲午痛创……九世之深仇未复,十年之胆薪何在……愿我国民,从兹勿忘此弥天之耻辱可耳。”李大钊又于数日后,在为《国耻纪念录》写就的《国民之新胆》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此次日本要索之主的,对于吾国,则断绝根本兴复之生机,毁灭国家独立之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他召唤

嘉峪关外是天山

金学钧

我站在黄崖关的北极阁上,曾想何处为北,塞外的凤凰楼可为北?凤凰楼虽为前哨,不可为最北,北之北有燕山主峰雾灵山之险。雾灵山就是最北吗?燕山之北为塞北坝上,亦不可为北。北之北,还有辽阔的草原,都是神州的版图。这才明白中国传统文化玄武之意,北斗七星高,水泽润中华。

何为西,金生丽水,玉出昆岗,一部二十四史已经把西域记得非常明白。龙腾中华,横贯东西,万里长城是最好的注脚。我来到明朝的天下第一雄关嘉峪关,观赏长城之西的风貌。这里地处西部,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冲,与阳关、玉门关形成古今防御体系。这里是长城的西起点,威震陇右,互通万里,连接今古。其实,汉武帝开拓西域,张骞、班超等中华杰俊,早已经打通了丝绸之路,奠定了多民族团结的基础,沟通了中亚、南亚乃至东欧的陆路交通。唐朝边塞雄风,大漠孤烟,直达葱岭;玄奘西行,横绝沙碛,遂使火焰山成为坦途。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轮台的古堡高昌的城,喀什的要冲天山的雪,已经成为中华血脉的澎湃流注。

在嘉峪关,我仰视西东,祁连山的千年积雪,讨赖河的万丈深渊,敦煌的飞天群像,月牙泉的不绝源流,让我惊叹于祖国西部的绝美画卷!在长城第一墩,风雨可雕蚀壁坚,沧桑还驻龙颜。祁连山蓝绿色的雪水,在讨赖河切下深深的臂弯,第一墩高高耸立在万丈绝壁之上,神龙摆尾,与嘉峪关

紧密相连,一气呵成,气壮云天。

嘉峪关城内没有黄崖关的八卦街,也没有山海关的波涛巨澜,但却有似钩的祁连月挂在高高的关楼之上,更有大漠沙如雪,直铺向西天的尽头。在这里,你可看到汉唐的烽燧和关卡遗址,你可听到千年的驼铃之声和角弓的劲鸣。每一粒黄沙不只是沙粒,而是闪光的星辰日月,是西域的沧桑故事,更是民族融合、国家一统的山河。行走在嘉峪关两侧,黄沙沙夯就的长城第一墩、悬臂长城,你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古代边塞诗人的绝唱,想起当年左宗棠平息动乱时载下的“左公柳”,更想起民族英雄林则徐流放伊犁途中写下的《出嘉峪关感赋》:“严关百尺界天西,万里征人驻马蹄。飞阁遥连秦树直,缭垣斜压陇云低。天山巉削摩肩立,瀚海苍茫入望迷。谁道骀函千古险?回看只见一丸泥。”道出了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万里征途,前路漫漫,雄关险塞,更壮英雄行迹,与他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胸怀气度一脉相承。

作为万里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丝路文化与长城文化在嘉峪关融为一体,光耀千秋。站在嘉峪关城头,我仿佛望见了雁门关、居庸关、黄崖关、山海关,东西横贯,南北交汇,江山一统,中华文化自豪感油然而生。不禁有感而发:“汉武开关通西域,张迁班固策马还。万重沙海岂可阻,千里旌旗更向前。楼兰已破功名在,瀚海横绝昆仑巅。莫言西出无故人,嘉峪关外是天山。”

以“义教”为炬 照救亡之路

——读《“义教”薪火 接力传承——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在天津》

韩鹏

吴琼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壮阔史诗中,党领导的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九”运动如惊雷划破暗夜,而天津的爱国学生与民众以“义教”为炬,在城乡之间点燃了抗日救亡的星火,为天津人民和全国人民一起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义教”薪火 接力传承——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在天津》,正是对这段特殊历史的深情回望与系统梳理。该书由中共天津市委党校、中共天津市西青区委组织部、中共天津市西青区委党校、王兰庄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总支,共同开展天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历史研究和资料征集,并联合编写,汇集大量史料和历史图片,从多层次展现了抗日救亡宏大背景下的“义教”活动如何将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紧密联结,为读者生动呈现了“一二·九”运动的地方实践。

全书的开篇由周巍、马兆亭两位专家撰写,围绕“一

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在天津的发端展开,概述了抗日救亡运动兴起与天津民先队成立,从日军侵华到中国共产党和天津的抗日行动;从天津学生响应“一二·九”运动到南下宣传,文章全面阐述了天津的抗日救亡运动与王兰庄村党支部创建,总结了天津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强调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青年作用的重要性,以及对民族复兴的启示。

该书一大鲜明特点是,编写工作创造性地采用了“回忆篇+访谈篇+传承篇”的三段式结构,以档案文献和口述采访为史实基础,集结“一二·九”运动亲历者回忆文章、后代的追忆访谈文章、党史专家学者的阐释文章和王兰庄村党员群众体会文章,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为读者多层次多角度呈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以王兰庄村为基地,在天津市郊及周边地区天津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投身波澜壮阔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王兰庄“义教”宣传的奋斗历程,及其精神价值的当代传承,从而构建了多维度的历史叙事。

“回忆篇”中,李哲人、秦雨屏、王绥昌、牛宝印等亲历者的文字带着岁月的温度。从南开大学学生剃发明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抗战文艺回眸

说到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我却想先从他的诗作说起。老舍写作风格幽默风趣,小说散文如此,诗亦如此,然而纵观他抗战时期的诗作,诗风雄浑苍劲,正是“史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老舍抗战时期写下的诗作不少,为抗战而歌,诗句之悲壮力透纸背。平津沦陷之后,老舍南下,1938年作三首同韵诗作,《流亡》诗曰:“弱女痴儿不解哀,率衣问父何去来?语因伤别满成泪,血若停流定是灰。已见乡关论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伤心》诗曰:“遍地人戈举目哀,天南有国亦难来。人情鬼域乾坤死,士气云龙肝脑灰。贼党轻言拥半壁,流民掩泣避风雷。更怜江汉风波急,艳舞妖歌尚浪催!”《自励》诗曰:“黄鹤楼头莫厌哀,酒酣风劲壮心来。烟波自古留余恨,烽火从今燃死灰。如此江山空暮雨,有谁文笔答云雷?奇师指日收河北,七步成诗战鼓催。”这样好的诗作,展现了在日寇铁蹄下,普通中国人的苦难、挣扎、反抗和觉醒。无论是《惶惑》《偷生》还是《饥荒》,这三部曲的每个阶段,都是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不屈不挠历程的真实写照。

1985年首播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被公认为“新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使得小说原作以影像的方式广为人知。电视剧呈现了一幅更为直观的老北平风情画。我最喜欢的是这部剧的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这是一首抗战文艺的经典之作,字数不长却堪称伟大的诗篇,虽只有区区八句四十八个字,却是对沦陷区苦难生活的高度概括,是压抑着的万般情绪的浓缩,包含着巨大的内部张力。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京腔京韵,碎字裂云……骆玉笙的演唱,是对词曲最好的诠释。所以一曲唱罢,词作者林汝为才会对骆玉笙说,歌词写出来的都唱出来了,而没来得及写出来的情感韵味,也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了。此言极是,知音者当有同感,未尽之意,言外之声,都得以无限延长。

词作者林汝为也是这部剧的导演,在《四世同堂》之外,她的另一代表作是《便衣警察》,而她亦是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的词作者。据说林汝为只用了十多分钟就完成了《重整河山待后生》歌词的创作,真是一蹴而就,这让人难以想象,却又合情合理,因为这并非雕琢之功,而是抗战给人留下的烙印,是情感的积累。生于1932年的林汝为,年幼之时曾目睹日寇的残暴统治,所以对于抗战题材的词作能够精准把握,她用女性博大的柔情,充分地认知、理解战争背后的人性与人情。这首歌曲的曲作者是著名作曲家雷振邦及女儿雷蕾,学生温中甲,雷蕾作为女性作曲家参与其中,演唱者骆玉笙同样也是女性,这首主题歌词曲俱佳,唱功亦绝,三者珠联璧合,闪烁着韧性刚强的母爱一般的光辉。

生于1914年的骆玉笙对此体会自然更深,平津沦陷时期,正是她演唱事业的起步期,她见证了日寇侵华以及天津沦陷。有“金嗓鼓王”之称的骆玉笙演唱此曲时已是古稀之年,阅尽沧桑的她能够在演唱中自然地修改曲调,“月圆之夜人不归”一句经她改定,更是低回婉转,直抵心肺。

抗战胜利已80周年,今天重温老舍、林汝为、骆玉笙和雷振邦雷蕾父女这些不同时代的名家联手呈现的一首抗战的壮歌,对后人来说,是颇有意义的纪念方式。

满庭芳

第五三八三期

志、北洋大学师生卧轨请愿,到法商学院教授杨秀峰带队冲破军警封锁,字里行间满是“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个平静书桌”的悲愤与抗争。

“访谈篇”则通过后代视角完成历史的接力讲述。姜思毅同志之子、慕湘同志子女等,分别回忆了父辈姜思毅、慕湘等爱国青年在天津开启革命生涯,从王兰庄“义教”宣传课堂走向全国抗日战场,为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往事。“义教”不仅是知识传递的课堂,更是统一战线的纽带、党组织的孵化器,以及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熔炉。点点滴滴的记忆填补了历史宏大叙事的缝隙,让“义教”不再是抽象的运动,而是具体的人在具体情境中的选择与坚持。

“传承篇”将历史拉回现实,承载了当代研究者和青年对“义教”在抗日救亡中多重意义的深入剖析和理解。郭宝印书记讲述如何秉承先辈精神,实干创业,告慰先烈;孙美月馆长介绍如何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纪念馆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李沐锦作为王兰庄中心小学学生,用稚嫩的声音完成“小导游”的宣传工作,这些都展现了“一二·九”精神在天津王兰庄的当代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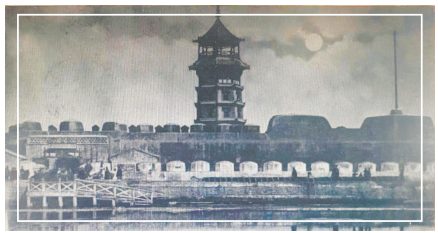
通读全书,最动人的莫过于历史细节中的精神闪光,《“义教”薪火 接力传承——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在天津》以扎实的史料与温暖的叙事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仿佛能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爱国学生街头游行的壮阔;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在乡间课堂共同唱出了奋发旋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胜利的欢呼雀跃。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不仅是枪与炮的交锋,而且是笔与心的对话;历史不仅仅是过去的故事,更是照亮未来的火把。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照耀现实,这本书将“一二·九”运动的历史经验传播发扬,对于当代中国青年应如何确立理想、选择人生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文物古迹里的天津故事(三)

七台棋布自崔巍

章用秀



南扼三河(海河、北运河、南运河),北拱京师,军事地位之高,居七座炮台之首。1840年,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北上闯入大沽口,海口炮台在与帝国主义的初次交锋中即告失陷。事后,清政府令顺天府大规模采办木料重建炮台,除海口外,还在天津、双港等地增建。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驻节天津,加强军事布防。同治十三年(1874)重建水师营于三岔河口,同时命大名镇总兵徐道奎在三岔河口北岸重修炮台。

这座炮台从形制到规模均不同于以往。炮台围墙高2丈,周长23丈,墙体用三合土夯实,外砌青砖,故有黑炮台之称。围墙外近河一面,筑墙一人多高的白色齿状矮墙一道,契合近距离射击需要。炮台内最具民族特色的建筑是一座砖筑五层八角形瞭望塔,塔高约五丈。塔基高出地面约5至6尺,塔身四层,每层八面各开瞭望窗一个,窗上分别镶有八卦符号。最上层为尖顶瞭望亭。塔门口有石刻对联一副。多年前曾有人在河北区一工地上见到一块宽约一尺、长约五尺的残条石,上刻“登临恣一览,拓开万里四夷……”之句,可能就是苏联的遗物。李鸿章仿长江水师之制,设督标水师中营(管带官1人、哨官32人、水师兵勇476人),配有舢板战船32艘,驻三岔河口炮台,故此炮台又有“水师营炮台”之称。

重建的三岔河口炮台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其威力未见发挥。然在1900年反抗八国联军入侵时,三岔河口炮台利用更新的武器“像火山一样地喷出了炮弹”,狠狠打击分布在老龙头火车站和紫竹林租界的侵略者。八国联军虽专门对付该炮台调来十二磅的重炮,但只是将炮台的瞭望塔炸坏,炮台仍岿然矗立在三岔河口。八国联军对三岔河口炮台恨之入骨,惊呼炮台火力“是我们所有伤亡的根源”,强烈要求拆除。在八国联军施加的压力下,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9月25日将其拆毁。

50多年来,三岔河口炮台遗址文物三次被发现。一次是在1969—1970年间的“备战”施工中,在这里挖掘出40棵梅花桩,应是当年炮台的基础。其北是“北大营”,即水师营。第二次是1983年河北区政府翻建办公大楼时,从地下挖出一门大炮和炮台台基木桩。第三次是在1985年狮子林大街小学翻建教学楼时,挖掘出原来预备充作军饷的铁铸咸丰钱币。这些发现都证明了三岔河口炮台基址之所在。炮台虽已无存,但当年炮台的雄姿和那段历史风云却深深镌刻在天津人的记忆中。

题图为1900年前完好的三岔河口炮台、瞭望塔和大门等。



沽上丛话